

PISA 改变了什么? *

——从学力评价看日本的教育改革

谭建川

(西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重庆 400715)

摘要:在日本学生参加 PISA 的十余年间,PISA 在日本的教育改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推动了日本教育政策的调整,而且也影响了日本的义务教育的结构性改革。不过,日本政府在解读和利用 PISA 的过程中,仍然出现了不少问题。例如,日本政府过于注重成绩排名,忽略学力分化和校际差距。这些都体现出日本的“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并未出现根本性的调整。

关键词:PISA;学力评价;日本;义务教育;教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G5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129(2014)05-0045-07

日本自 2000 年参与“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以来,每一次成绩都成为国内媒体和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作为一种多维度、实质性的国际教育评价体系,PISA 具有强烈的服务教育政策的指向,在 21 世纪的日本教育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分析日本迄今参加的 5 次 PISA 以及其间所推行的改革措施,探讨学力评价与教育改革之间的紧密关系,能够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日本教育改革的内在逻辑与整体走向。

一、PISA 的测试体系及日本学生的表现

(一)PISA 的测试体系

PISA 是“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的简称,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以成员国(也包括部分非成员国)义务教育阶段末期的 15 岁学生为对象进行测试的评价体系。PISA 并不以各国基础教育阶段的课程标准为基础,也不以学科知识为中心,其测试的主要内容为评价学生在阅读、数学以及科学方面所具备的运用已学知识、态度和技能去解决不同情境中的问题的“素养”(literacy),评价方式除了认知测验外,还包括问卷调查,用以收集有关社会、文化、经济和教育因素的各项指标。PISA 自 2000 年首次实施以来,每 3 年举行 1 次,每次将阅读素养、数学素养、科学素养中的一个领域作为重点内容,其他两个领域作为次要内容。它不仅对各国和地区在各领域的成绩进行排名,而且也发布达到各个能力等级水平(proficiency level,又称“精熟度水平”)的学生比例。迄今为止,PISA 已经举行了 5 次,参加国家和地区从 2000 年的 32 个增加到 2012 年的 65 个,特别是 2009 年 4 月上海市以地区身份参加了正式测试,

* 收稿日期:2014-07-27

作者简介:谭建川,历史学博士,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西南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研究员。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当前日本义务教育改革的教育公平问题及其对重庆市的启示”(2012-GX-023),项目负责人:谭建川。

从而使 PISA 覆盖了占世界经济总量 90% 的国家和地区,成为影响最大的国际教育评价项目之一。

与美国的 SAT 测试、英国的 A-Level 考试,以及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美国 AP 测试不同,PISA 并未将着眼点放在甄别考生个人学业成就上,它不仅多维度地记录学生素养高低及构成,而且从质量和公平的视角出发,探寻影响学生学业成就的个人、学校、政府和社会的原因,从而促使政府和社会各界反思其教育政策,为教育改革提供依据和导向。另外,PISA 项目的独特之处在于:测试对象是处于义务教育阶段末期的学生(15 岁学生),评价的是他们作为未来社会公民,在工作和社会生活中,如何运用已学知识和已具备的技能和态度去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并非如传统评价所强调的学生对事实性知识的复述和再现的能力,而是综合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是满足“目前和将来的个人生活、职业生活、社会生活,以及作为建设性的、有爱心的及反思性的公民的需要”的基本素养。除此之外,PISA 也重视在问卷调查中要求学生报告他们的学习参与度、投入程度(engagement)、学习策略和学习兴趣,因为这些因素是学生适应未来社会生活所必须拥有的重要品质,所以 PISA 所要测试的核心问题是:学生作为预备的劳动力是否已经为迎接未来的挑战做好了准备。

(二)日本学生起伏不定的表现

总体而言,日本学生的各次 PISA 成绩排名均能保持在上游水平,不过每次都略有波动。在 PISA 2000 中,日本学生的成绩为阅读 522 分(第 8 名)、数学 557 分(第 1 名)、科学 550 分(第 2 名),其中:在阅读素养的精熟度水平中,达到最高水平(5 级)的学生占总数的 9.9%,而位于最低水平(1 级以下)的学生占 2.7%,70% 以上的学生都在 3 级以上,是优劣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在 PISA 2003 中,日本学生的成绩为阅读 498 分(第 14 名)、数学 534 分(第 6 名)、科学 548 分(第 2 名),阅读和数学成绩出现大幅度下降。另外,在学习背景调查中,选择“喜欢数学相关书籍”(13%)、“喜欢数学课”(26%)等项目的学生比例以及每周课外做作业和学习的时间(6.5 小时),都远低于各国平均的水平。在 PISA 2006 中,日本学生的成绩为阅读 498 分(第 15 名)、数学 523 分(第 10 名)、科学 531 分(第 6 名),下降趋势仍然持续,在作为主测领域的科学素养中,“科学地解释现象”一项仅列第 12 名,体现出日本学生在阅读以及语言表达能力下降的同时,对于科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也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在 PISA 2009 中,日本学生的成绩排名出现一定程度的回升,其中:阅读(520 分,第 8 名)上升幅度最大,而数学(529 分,第 9 名)和科学(539 分,第 5 名)也止住了下降的势头。不过,在阅读素养的精熟度水平比例中,尽管与 2003 年和 2006 年相比,2009 年的低水平比例减少,高水平比例增加,但是与 2000 年相比,2009 年的中水平组比例大幅下降,而位于最低水平(1 级以下)和最高水平(5 级)的学生比例都有所增加,表明学生的能力差距在进一步拉大。在 2013 年 12 月公布的 PISA 2012 排名中,日本学生的成绩进一步上升,分别为阅读 538 分(第 4 名)、数学 536 分(第 7 名)、科学 547 分(第 4 名),但是在高水平的学生比例继续增加的同时,低水平的学生比例并未减少,说明学生和学校的性能差距在持续分化。

二、PISA 对日本教育改革的影响

(一)“PISA 危机”引发了日本教育政策调整

在 1998 年,日本政府修订了中小学国家课程标准——“学习指导要领”,大幅度缩减授课时数并精简教学内容,减少中学阶段必修课的学分,确立了通过创造宽松的学习环境来培育学生“生存能力”的改革理念。可是,伴随着“宽松教育”的出台,日本国内出现了很多质疑之声,不少学者批评文部科学省所谓的“新学力观”片面强调培养问题解决的能力,将基础知识和技能的习得排除在学力核心之外,产生了“对智育这一重要的教育侧面的曲解”^[1]。但是日本政府却以没有确凿数据证明学力是否真的下降为由继续全力推进“宽松教育”。不过,随着 PISA 2003 结果的公布,新闻媒体

开始大量报道日本学生的惨败,引发了被称为“PISA 危机”的批评浪潮。在 PISA 2003 中,日本学生在阅读素养方面的成绩下降幅度是参与国中最大的,日本学生在以图表等“非连续性文本”为主的论述题上的无应答率和错误率远高于平均水平,并且调查也显示日本学生几乎是参与国中学习时间最少、也最不爱学习的。这样的结果极大地震撼了一直自诩本国教育水平很高的日本人,并迅速将主要原因归结为“宽松教育”。在确凿的 PISA 数据面前,文部科学大臣中山成彬不得不无奈地表示“清楚地认识到的确出现了学力低下的倾向”^[2],正式承认政府在教育政策方面出现了偏差。

为了应对“PISA 危机”,文部科学省成立了“PISA 应急工作组”,召集由社会知名人士以及文部科学省、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的重要官员组成“代表者会议”,共同对 PISA 2003 进行评价和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政策调整的指导意见。工作组在 2005 年 12 月制定了以阅读为中心的“阅读能力提高项目”,提出日本教育的目标应该调整为培养“PISA 型阅读能力”,并将其定义为“理解、运用和反思文章的能力,以增加个人的知识,发挥个人的潜能,参与社会活动,实现个人的目标”,从而与 PISA 所提倡的“阅读素养”接轨,并要求各级学校从提高学生的文本理解评价能力、书写表达能力以及增加学生阅读和发表机会三方面进行教学改革。文部科学省迅速编辑了《提高阅读能力的教学指导资料》并于 2006 年 4 月下发到全国中小学。可以说 PISA 2003 犹如一枚重磅炸弹,激起日本官方对基础教育中出现学力低下现象的重视和探讨,一时间 PISA 成为日本教育改革中最为热门的词汇。

2007 年 12 月,PISA 2006 的结果公布,日本学生的各项成绩排名未见起色,反而有继续下降的趋势。针对这一现象,《朝日新闻》以“应用能力继续下落”、“理科从高端跌落”等标题进行大肆报道。《读卖新闻》也刊发社论指出:“上次 PISA 调查明确体现出阅读能力的低下,本次调查又凸显理科应用能力的低下,‘学习指导要领’的重新修订已经刻不容缓。”^[3]面对日本学生在 PISA 中的节节败退以及舆论的批评浪潮,首相安倍晋三的咨询机构——教育再生会议以及中央教育审议会都要求尽快对“学习指导要领”进行全面调整,以期扭转“学校教育导致学力下降”的尴尬局面。文部科学省于 2008 年 3 月公布了新修订的“中小学学习指导要领”,并于 2009 年 3 月公布了“高中学习指导要领”。在此次修订中,国语、数学和理科的学时和内容都得到增加,一些被删减的内容得以恢复(例如小学算数的圆周率从 3 又回到 3.14,初中英语词汇量由 900 个增加至 1 200 个)。对于此次修订,中央教育审议会副会长梶田叡一如此解释:“在减少授课时数和授课内容的情况下培养‘生存能力’,意味着‘生存能力’是在学习之外的地方得到培养的”,“此次的修订考虑的却是必须通过学习才能够培养‘生存能力’。在人类的成长和发展中,不知道基础的知识技能,就无法思考,也不能进行理性的判断。”^[4]可以说,正是因为 PISA 中立客观、确凿可信的数据以及在国民中的巨大影响力,让日本政府不得不对“宽松教育”将基础知识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割裂开来的做法进行反思,并迅速采取行动进行政策方面的调整。

(二)PISA 推动了日本义务教育结构性改革

随着全球化的到来,国际竞争日益激烈,日本政府认识到由上而下的中央集权式教育行政无法发挥地方和学校的积极性,应该在推进地方分权改革的同时加强国家对义务教育的目标和成果的管理。2005 年 10 月,中央教育审议会发表名为《创造新时代的义务教育》的报告,提出义务教育结构性改革的构想:国家负责制定改革目标(相关教育法律和“学习指导要领”)并负责培养教师和保障经费来源;推进并扩大分权改革,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和学校的积极性;由国家举办全国性的学力调查,建立学校评价体系。通过这一构想,义务教育被划分为国家的目标设定、地方及学校的具体实施、国家的结果验证三大部分。国家将“放宽权限”与“成果评价”结合起来,其责任除了“事前规制”(制定目标),更包括“事后评价”(学力评估),从而将义务教育改造成为具有日本特色的“两头紧

中间松”的目标管理体系。

在目标设定方面,尽管 PISA 并不以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标准为基础,也不以学科知识为中心,其测试的是比传统意义上的读写算能力更广泛的素养,但是并不否定以学科知识为中心的学校教育是培养这种素养的主要场所。从这一点而言,PISA 的评价理念对于日本中小学教育目标的设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屡屡受挫于 PISA 之后,日本从“素养”这一全新概念中看到了“活用能力”的重要性,强调用“知识活用”将“习得型教育”和“探究型教育”重新整合起来,并以此将教育目标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正。在新的《学校教育法》第四章中,关于小学的教育目标如此规定:“在教授基础知识以及技能的同时,也要培养其活用基础知识和技能解决课题的思考能力、判断能力和表现能力,特别是要培养学生主体性地参与学习的态度。”这样的目标规定明确了基础知识与活用能力、学习态度之间的有机结合,可以说是“PISA 型学力”的日式阐述。而此后的“学习指导要领”也处处体现出以 PISA 为蓝本的目标设定。

而在成果评价方面,借鉴 PISA 的评价理念、实施流程及评价方法,文部科学省开始探索建立适合日本国情的教育评价模式。经过精心准备,新世纪的第一次全国学力调查于 2007 年 4 月 24 日正式实施。与 PISA 的抽样调查不同,日本政府耗资 77 亿日元,针对全国 99.6% 的小学 and 97.4% 的中学近 225 万名小学 6 年级学生和初中 3 年级学生进行了调查,此后每年举行一次。调查由学力测试和背景问卷调查组成,其中学力测试包括国语和数学两科,题目分 A、B 卷,A 卷测试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B 卷测试应用能力。问卷调查既有面向学生的问卷,也有面向学校的问卷,内容涉及学习愿望、学习方法、学习环境、生活状况、教学方法、师资、设备配备等。全国学力调查受 PISA 的影响很大,特别是 B 卷无论是在题目设计、呈现方式,还是在要求标准、成效测量方面均模仿了 PISA。例如在小学 6 年级的数学 B 卷中,有一道要求学生回答乘车出发去博物馆的汽车班次的问题,题中除了告诉学生在博物馆集合的时间以及路上花费的时间外,还列出了一张公共汽车时刻表,以此来考查学生是否具有运用所给条件筛选有用信息、解决生活中的数学问题的能力,此类题型在 PISA 中是屡见不鲜的。

三、日本解读 PISA 所出现的问题

(一)片面关注排名高低,忽视教育公平方面的数据

回顾日本参与 PISA 的这十余年时间,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日本政府、大众传媒以及普通民众都热衷于日本学生在 PISA 中的成绩排名,排名一下降便哀声一片,排名一回升则拍手称快,从而使 PISA 成为政府调整教育政策的重要外部力量。由于 PISA 的学力平均值在一定程度上仅反映本国学生作为一个整体所体现的可评测的“学力水平”,所以通过数值升降便认为所有学生个体的学力水平提高或下降的解读方式是极不科学的。例如在 PISA 2009 中,尽管日本学生的排名回升到 2000 年的水平,但是从优生(5 级)与差生(1 级以下)的阅读素养精熟度分布而言,PISA 2000 的优、差生的百分比分别为 9.9%、10.0%,PISA 2009 分别为 13.4%、13.6%,优生比例都有大幅增加;从“上位 25%”(即取得最好成绩的 25% 的学生)和“下位 25%”(即成绩最差的 25% 的学生)的分差来看,4 次 PISA 的平均分差为 111、143、136、131,显示出 2000 年之后学生的两极分化状态并未得到改善;PISA 2000 的阅读题中有 26 道与 PISA 2009 属于共通性问题,但是 PISA 2000 的正确率为 65.2%,PISA 2009 却只有 61.8%。可见成绩排名相同,也只能说通过一系列调整措施并改善教学方法,日本学生在部分有限的领域出现了学力恢复的征兆,而另一方面却出现了学力两极分化的新问题,情况并不如想象的那么乐观。

其实,PISA 对于教育政策调整的重要性在于:它不光满足于测试学生个体素养和成绩的高低,

而是继续深入研究影响学生素养的教育与社会原因,包括办学效能、学校均衡、家庭背景、政府投入等因素对学生的影响,也就是人们通常关注的教育均衡与教育公平等社会问题和政府责任。对比日本在 PISA 的各项成绩,尽管在反映家庭经济地位与学生成绩之间关联性的“ESCS 指数”(PISA Index of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Status)方面,日本学生的成绩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和家庭财产的关联性处于经合组织成员国的较低水平,但是通过 PISA 2009 的数据可以看到,有 30% 的日本学生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占多数的学校里就读,此类学校的在校生有 67% 来自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且成绩明显处于低位水平;总数 31% 的日本学生在富裕学生占多数的学校里学习,在校生中只有 8% 来自经济困难的家庭,而家庭经济条件优越的学生的测试成绩远高于预期水平。另外,以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校间成绩差异平均值 42.0% 作为参照,日本的校间成绩差异值高达 58.7%,不仅远高于芬兰(7.7%)、挪威(10.1%)等公认的学校均衡发展的国家,甚至大大超出美国(42.0%)和英国(32.0%)。这些都反映出日本从义务教育阶段就已经存在显著的学生分流趋势,而且校际差距与学力分化紧密关联。不过,日本国立政策研究所在 PISA 2009 日文版中仅用不到 20 页的篇幅对日本教育的社会经济因素进行概述,仍然强调日本是“教育机会平等性很高的国家”^[5],并没有从国家政策和政府责任的角度进行深入探讨,显然“忽略”了 PISA 的数据在教育公平方面所体现出来的重要意义。

(二) 学力评价成为支配教育发展的绝对性因素

另一方面,PISA 在日本义务教育结构性改革中也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特别是促成了日本政府重新实施全国统一的学力调查。不过,与 PISA 不同的是,日本的全国学力调查除了有政策评价功能之外,还具有十分重要的教育行政评价和学校评价功能。文部科学省发表的总体报告以及都、道、府、县的分报告,其中都包括答题的正确率、平均分、标准差等,而各市、町、村以及学校的相关数据则发到市教育委员会。在“问责制”、“质量保证”等一系列口号之下,中央政府通过对各都、道、府、县在学力调查中的排名成绩来评估该地区教育预算与政策是否取得预定成果,各自治体则通过市、町、村的排名来评价下级教育行政机构以及中小学的工作业绩。正是由于学力调查具有重要的业绩评价功能,对于各自治体而言,学生成绩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行政长官是否能够继续得到当地选民的投票支持;而对于中小学而言,由于“中高一贯制学校”、自由择校制的推行,学校的成绩排名直接与招生质量、教师评价紧密关联。尽管中央教育审议会要求“慎重使用所收集和掌握的调查数据”,“避免学校间的名次排队和过度竞争”^[6],但最终还是无法避免各自治体和学校之间为提高成绩而产生的激烈竞争。

另外,正如大阪府教育委员会在 2009 年发布的《大阪教育力提升计划》中所规划的那样,教育目标被细化为“学生在学力调查中无应答率降为 0”、“学生在学力调查中选择‘对将来有梦想和目标’一项的比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等 60 个分目标^[7],教师被严重束缚在作为“绝对价值”的学力评价上,其专业性、创造性和积极性无法发挥。可以说,学力评价的权力控制与支配功能已经被强力注入日本的学校教育中,“本来仅仅作为教育过程配角的评价,却成为主角强力支配着教育”^[8],从而促使学校、地区之间为获得更多的市场利益而激烈竞争,也使得教师和学生为了实现直接以学力评价为标杆的目标而疲于奔命。

四、日本教育改革的内在逻辑及启示

(一) “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并未出现根本性调整

PISA 的产生缘于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基础教育质量的质疑与反思,由于其评价工具具有良好的信度、效度和可比性,能够以多侧面、多层次的数据和证据为依据,改变教育政策制

定过程中所需信息数据严重不足的状况,因此成为国际上颇具影响力的学力评价系统。正如经合组织反复强调的那样,“PISA 的宗旨在于,帮助各国了解它们的学校系统在质量、公平和效率方面与全球水平的平衡状况”^[9],从而使政府根据 PISA 的数据而提出的建议更科学、更有说服力。回顾日本参与 PISA 的十余年时间,政府能够积极修正教学大纲、教学方式,为提高学力水平努力寻找改善教育的途径,并且积极探索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教育评价模式,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而与此同时,由于过于追求质量和效率,忽略教育的公平与均衡,加之学力评价成为支配教育发展的绝对性因素,这些都给日本的基础教育带来了不少问题。

直至今日,面对学力分化日益扩大及义务教育体系日益失衡的问题,日本政府仍旧没有如当年 PISA 排名下降那样大惊失色。究其原因,还是在于自上世纪 90 年代日本追随美、英进行“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的整体走向并未出现根本性的调整。由于日本是在基本完成教育公平这个任务之后才开始推进新一轮教育改革的,中小学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如何在数量上去满足社会的需要,而是如何提高人才的培养质量,以应对日趋激烈的全球化竞争的需要。因此政府在面对基础教育改革时,将“新自由主义”所提倡的效率、竞争、自由化、市场化规则作为改革的主要理念。无论是 PISA 间接影响的目标评价体系、全国学力调查,还是与此紧密关联的“中高一贯制学校”、自由择校制度,其原理都在于通过学校的自由竞争办学、家长的自由竞争择校来引导教育资源的有效分配和消费。正是由于过于强调选择性的市场机制来重建学校教育,从而使家庭的经济社会资本越来越成为影响儿童教育的重要因素,加之为了克服不断扩大的财政危机而减少投入,政府所应承担的提供优质而无差异的教育资源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责被大大弱化,必然会出现对部分社会阶层或群体有利,而对另一部分社会阶层或群体不利的问题,从而使日本苦心经营多年的教育公平受到极大损害。

其实,即使是人人喊打的“宽松教育”,其本身也是“新自由主义”在日本教育改革中的重要措施之一。日本政府希望基于“多样化”、“自由化”的市场竞争理论,通过建设宽松的、个性化的教育环境来培养创造性的人才。日本政府之所以积极对其教育政策进行修正,并不是否定“新自由主义”的竞争原则,而是迫于 PISA 成绩排名的客观性以及国民中的巨大影响力,加之认识到改革理念与实际操作的确出现了许多“矫枉过正”的现象,因此必须通过政策回调来平息汹涌而至的批评浪潮。当时的教育课程审议会会长三浦朱门就曾经满不在乎地说过:“只要平均学力不下降就没问题。关注儿童教育所做的最后努力应放在最大限度地挖掘天才的潜质上,一百个人中只要有一个人好,这些人就可以支撑起国家的发展。对没有天赋能力的‘非才’,只培养踏实、认真肯干的精神就好。”^[10]因此,当 PISA 2009 的成绩排名一公布,日本政府就迫不及待地赞扬“迄今为止的各种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11],对排名进一步攀升的 PISA 2012,日本政府更是认为“政府的政策被证明是正确无疑的”,日本学生“完美地实现了 V 形反转”^[12],而对于日益增多的差生比例、以及排名高达经合组织第 2 名的校间差异值却仅仅轻描淡写,一带而过。

(二)日本对 PISA 的解读方式带来的启示

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逻辑与从教育自身的逻辑来理解 PISA 并指导教育改革,其原理、思路和效果会截然不同。教育并不等同于企业运营,其质量的提高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必须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才能发生作用。而在这些因素中,课程内容、教学方法、教师素质以及学生的学习动机等内在因素才是最为根本的。PISA 作为评价工具,其最大的作用便在于客观而完整地反映出这些内在因素的现实状况,它本身提供的仅仅是一种非学校内生的动力机制,以此促使政府在未来的教育政策调整中能够更好地实现学校教育的内在因素的完美组合,从而达到 PISA 所提倡的公平而卓越的教育质量衡量标准。正如一桥大学的山田哲也教授指出的那样:“不能仅对体现

平均值的国家排名一喜一忧,也不能用评价来作为强力支配教育的内在动力,而应该从教育本身出发,将 PISA 作为追求教育公平和卓越的重要工具来进行活用,这才是对 PISA 最为贴切的解读方式。”^[13]从政府的角度而言,最为关键的不是利用 PISA 的排名来支配学校教育发展,而是应该在正确解读 PISA 的基础上,提高教育理论在实践改革中的地位,使教师与学生真正成为有改革意义的新行为方式的主要实施者,并努力提供政策保障以推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 [1] 钟启泉. 学力·学力论争·学力模型——日本学力说的演进[J]. 上海教育科研,1997(5):1-7.
- [2] 「学力低下傾向認識すべきだ」中山文科相[N]. 朝日新聞,2004-12-07(4).
- [3] 国際学力調査:結果を新指導要領に生かさねば[N]. 読売新聞,2007-12-05(8).
- [4] 梶田叡一. 新学習指導要領と「生きる力」[DB/OL].(2011-12-20)[2014-06-27]<http://www.bunkei.co.jp/school/column/0805>.
- [5] 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 生きるための知識と技術 4・OECD 生徒の学習到達度調査(PISA)2009 年調査国際結果報告書[M]. 東京:明石書店,2010:233.
- [6] 田中耕治,孙诚,高峡. 学力調査若干問題探析[J]. 教育研究,2006(7):35-39.
- [7] 大阪府教育委員会. 大阪の教育力向上プラン[R]. 2009.
- [8] 佐貫浩. 関心・意欲・態度評価の問題性をどう解くか[J]. 教育,2011(12):38-46.
- [9] 张民选,陆璟,占胜利,等. 专业视野中的 PISA[J]. 教育研究,2011(6):3-10.
- [10] 柴田義松. 学力低下論再燃の原因は何か[J]. 現代教育科学,2002(4):98-104.
- [11] OECD 生徒の学習到達度調査(PISA 2009)について「高木文部科学大臣コメント」[DB/OL].(2011-12-22)[2014-06-27]http://www.mext.go.jp/b_menu/daijin/detail/1299985.htm.
- [12] PISA 2013:日本の学生はV型反転[N]. 毎日新聞,2014-1-10(6).
- [13] 山田哲也. 保護者の社会経済的背景と学力:PISA 報告書が示す日本の現状と課題[J]. 教育,2011(6):30-36.

What Has the PISA Changed?

——an overview of Japanese educational re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arning capacity evaluation

TAN Jian-chuan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Center for the Research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The PISA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Japanese educational reform since its application a decade ago. Not only has it promoted the policy adjustment on education, but also influenced the structural reform on compulsory education.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lots of problems when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explains and uses the PISA. For example, the government places too much importance on the performance ranking with the negligence of the differences on learning capacity and schooling quality. This shows that no fundamental adjustment has occurred during the “neo-liberalism” educational reform in Japan.

Key words: PISA; learning capacity evaluation; Japan; compulsory education; educational reform

责任编辑 唐益明